

苏联哲学资料选辑

第二十六輯

(內部讀物)

苏联哲学资料选輯

第二十六輯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請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苏联哲学資料选輯

第二十六輯

《哲学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1966年6月第1版

1966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2074·336 定价：1.15元

編者說明

本书是《苏联哲学資料选輯》第二十六輯，选的是費多謝耶夫、米丁、康斯坦丁諾夫、奥伊則尔曼、姆什維尼耶拉泽等編輯和撰写的《人和时代》（苏联科学院出版社 1964 年版）。

費多謝耶夫（П. Н. Федосеев, 1908—），苏联哲学家，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員，现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哲学、法学部院士秘书。

米丁（М. Б. Митин, 1901—），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 年），在苏共第十八、十九和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均曾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員，现任苏联《哲学問題》杂志主編。

康斯坦丁諾夫（Ф. В.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1901—），苏联哲学家，苏联科学院通訊院士（1953 年），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曾当选苏共中央候补委員，担任过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1954—1955 年）、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55—1958 年）、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主編（1958—1962 年），现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奥伊則尔曼（Т. И. Ойзерман, 1914—），苏联哲学家，博士（1952 年），教授，现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主任、《莫斯科大学学报經哲类》編委。

姆什維尼耶拉泽（В. В. Мшвениерадзе），苏联哲学家，副博士（1957 年），高級研究員。

本书系內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不得引用本书名，請仍用原书名和版本，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有限，本书在翻譯和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6 年 1 月

人 和 时 代

〔苏〕 П. Н. 費多謝耶夫、М. В. 米丁、
Ф. В. 康斯坦丁諾夫、Т. И. 奧伊則
尔曼、В. В. 姆什維尼耶拉泽等編

目 录

前言	(1)
当今世界中的人道主义	П. Н. 費多謝耶夫 (3)
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人	М. Б. 米丁 (42)
人和社会	Ф. Б. 康斯坦丁諾夫 (81)
人及其异化	Т. И. 奥伊則尔曼 (110)
論现时代资产階級哲学世界观的危机	Г. А. 庫尔桑諾夫 (126)
我們世紀的大变动	Х. Н. 莫姆江 (137)
人在宇宙飞行时代	Ю. К. 梅尔維尔 (165)
人和技术	П. Б. 科普宁 (194)
社会进步問題	М. Н. 魯特凱維奇 (210)
意志自由和責任感問題	Б. С. 曼科夫斯基 (224)
为反人道主义服务的唯心主义認識論	В. В. 姆什維尼耶拉泽 (234)
资产階級哲学家把“价值”和“生活世界”的概念	
偶像化的用意何在?	Н. В. 莫特罗希洛娃 (252)
国际哲学會議和现代哲学問題	Ю. С. 列別杰夫 (266)

前 言

1963年9月在墨西哥（墨西哥城）举行了第十三届国际哲学会议，以苏联科学院副院长 И. И. 费多谢耶夫院士为首的苏联哲学家代表团积极参加了会议的活动。苏联的学者们在讨论“人的问题”和“对我们时代的批判”这些题目的全体大会上作了报告，参加了讨论会和分组会议的活动。苏联哲学家的主要报告曾用英文出版过数量不多的单行本。那本书引起会议代表们的极大兴趣，很快就散发完了。

提请读者注意的《人和时代》一书是一本专题论文集，它收集了苏联哲学家在会议上围绕着重在全体大会上提出的主要问题所作的报告。本书的书名和它的论战性质都是由此产生的。收入本书的报告还补充有对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会议上的发言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因而变得更加充实了。

本书没有自以为详尽无遗地分析了与阐明现时代中人的问题有关的许多问题。它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立场出发，批判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国家里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对人的问题最流行的观点。个人问题是最重要的哲学问题之一。围绕着重这个问题正紧张地进行着残酷的、极火热的斗争。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对这个问题作出正确的理论解释，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对这个问题的实际解决，它们保证了人及其才能、禀赋得到全面发展的条件。

在筹备这本论文集出版方面的学术辅助工作，是由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人员 И. И. 索罗考姆斯卡娅和 О. И. 阿美杰夫斯卡娅作的。

（静之 译）



当今世界中的人道主义

II. II. 費多謝耶夫

在现时代，共产主义意識形态与资产階級意識形态之間的斗争是階級斗争的一种最重要的形式。世界舞台上两个不同的社会体系的斗争在其中得到了反映。哲学世界观的斗争、哲学原理和哲学观念的冲突在思想斗争过程中越来越具有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的敌人自己也不再相信說社会主义制度在經濟或政治方面已經破产这种謊言，因为反駁这种臆測的事实是太明显了。现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們企图証明：任何一种社会改造（包括社会主义改造）都不能改变人的本性，人的本性的基础仿佛是由某种純粹人类学的、而且是固定不变的人的本质构成的。

目前，资产階級哲学更加大叫大嚷地提出人和人的价值問題，打算在这些問題上掌握主动权，并把这方面的功績归諸“自由世界”。在第十三届国际哲学會議上，关于这些問題展开的思想斗争証明，资产階級哲学家們的論据是十分貧乏的，他們关于資本主义社会个人尊严的論断是完全虛伪的。他們害怕具体地、历史地提出問題，并且千方百计地躲避問題。同时，显而易见，马克思主义者必須更加积极地闡明和解释个人及个人全面发展的問題，粉碎资产階級哲学关于人的自由和权利的抽象思辨。

资产階級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习惯于在个人自由問題上胡說八道，他們說，仿佛在資本主义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則沒有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似乎不能解决人的問題。可是，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才揭露出虛幻的个人自由和实际的个人自由之間的根本区别，恰好是社会主义才証明如何才能实际地解决人和人道的

問題。

人之所以成为人是社会造成的，而人本身又用自己的活动創造和改造社会。

“人”这个概念，按其内容來說，在历史上曾經发生过而且现在繼續发生着一系列重大的变化。假如用我們現時关于人的观念去考察社会的历史，那就不难看出，在过去的各个时代里对人的理解通常是狹隘的，甚至拒絕承认很大一部分居民有权称作人。有个时期，曾經把奴隶和下等人从“人类”这个概念中排除出去。人性的标准是按照性別来决定的，这就造成歧視妇女，貶低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时，人的本质这个概念仅局限于象宗教信仰这样一些特征。这样一来，异教徒仿佛就沒有作为人的这种不可剝夺的权利。

种族属性也被看成仿佛是人性的一种决定性标准。有些人向一些种族的代表灌輸这样的思想：仿佛这些种族的代表优越于另一些种族的代表。有些人在过去和现在正是在这种“理論”的基础上为大量屠杀人的行为作辯护。直到现在，种族歧視仍然还在南非共和国或美国这样一些国家中广泛流行，并容忍由于肤色和发色的不同而对人进行駭人听闻的愚弄。直到现在，某些学者仍在出版一些以科学作为幌子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煞有介事地企图証明人們在社会上的不平等有着某种永恒的、难以克服的种族基础。

諸如此类的理論的产生，不只是由于这些理論的創立者的个人偏见，而是由于特定的社会条件，它們产生和培植着这样的“理論”。在很多国家，人剝削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少数人——特权階級——的富裕生活是依靠无代价地攫取千百万劳动者的絕大部分劳动成果，依靠掠夺一系列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附属地位的国家 and 民族来維持的，这些就是对人进行实际限制的根本社会基础和主要社会祸害。

“人”这个概念是社会理論的产物。社会領域也同社会理論一样，始終是各种利益进行残酷斗争的舞台。也許正因为这样，历史才是在理論上对人的本质、人的本性以及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概念所作的那些极其荒謬的歪曲的見証人。

人和人性的进步

“人”这个概念的科学定义是在社会和社会思想漫长的进化过程中逐渐制定出来的。

大家知道，在地中海地区的奴隶制社会中，这个概念只用于指自由人。希腊人认为奴隶仅仅是肉体(Soma)。例如：創立“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学說的柏拉图把奴隶制說成是自然的、永恒的。他贊同奴隶是“兽类”这种說法(《法律篇》，777 B)。

罗马法典只把古代城市的公民(奴隶不是公民)或者君主的臣民(女人不是納稅单位)称为人，也就是从显然受到限制的人的概念(«servus nullum caput habet»)出发(Paulus, 1. 3, §1, D. 4, 5; §4, j. 1, 1B)。罗马的法律把奴隶同畜牲或什物置于同等地位。条文上写着：“奴隶或者其它畜牲”(«si servus petitus vel animal aliud») (1. 15, §3, D. 6, 1)。在阿克維利埃的法律中(大約公元前 287 年)，奴隶沒有权能：“至于公民权利，則认为奴隶“絲毫也沒有”(1. 32, D. 50, 17; 1. 8 pr., D. 28, 8)。

某些同样局限的关于人的理論观念是与古代社会中实际存在着的对人的限制相对应的。那时，在“人”这个概念中仅包含階級的和部落的(民族的)特征，奴隶和异族人(所謂“野蛮”民族)都被排除于这个概念之外。大家知道，随着奴隶社会矛盾的加深以及物质体力劳动之被輕視，这些限制就愈益加强了。

由于古代奴隶制发生危机，在斯多葛学派，特別是在新斯多葛学派的哲学中，人的問題被轉移到道德領域之內。除了肯定人有天然平等之外，开始把奴隶制看成是“人的情欲的俘虏”。这一时期的某些学說中，有时把奴隶制描繪成某些与人相敌对的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看成人的好运和恶运变化无常所产生的结果(彼特罗尼、朱味那尔等)。

随着古代奴隶制社会的崩潰，开始不仅把自由人而且把同族人

看成人。可是，后来的哲学体系毕竟接受了古代奴隶学说的許多原理，特别是斯多葛学派的概念。例如，关于天然的、自然的秩序两种状态，即绝对状态与相对状态的学说，便給这些学派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学说认为：如果在绝对意义上不能断言人按其本性就注定是給人服务的，那么在相对意义上完全能够說一种人注定要领导，另一种人注定要服从別人的意志：*hunc hominem esse servum, absolute considerando ... non habet rationum naturalem, sed solum secundum aliquam utilitatem consequentem.....*（“从绝对意义說，使人成为奴隶是不符合自然的法规的，但是，只要从某种利益上去考虑，却是可能的”）（*Sum. Theol.*, II; q. 57, a. 3, ad. 2）。

长时期內，一系列学说把奴隶制說成是自然的。例如，根据奥古斯丁的学说（*De civitate Dei*, XIX, C. 15），奴隶制是原罪的结果，既然如此，那么天意加到人身上的限制便是永恒的、不变的了。托马斯·阿奎那完全本着自己学说的精神断言：“人間的奴隶制是自然的”；“奴隶是自己主人的工具……特殊的統治权把主人和奴隶联系在一起”（*De just.*, q. 57, art. 3 和 4）。教会的很多官方文件，例如格兰斯基会议（358 年）^①的決議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制定出来的。

从前，农奴也同样不被看成是人。十三世紀法国著名的法律学家菲利普·德·博曼努（約 1250—1296 年）在自己的名著《博維茲的风俗》（《*Coutumes de Beauvaisis*》）第 1452 节中确认：“农奴的人身依附（*servitudes*）有很多状况。因为任何一个农奴都从属于自己的領主，这些領主能够支配这些农奴的全部财产，掌握有（对农奴的）生死权，能够任意决定拘留他們——不管有罪无罪——，对于他們誰也不負責任，除非是上帝。”

在十四世紀，随着欧洲开始殖民主义扩张，对人道主义的限制采

① “罪大恶极的是这样一种人，他在篤信宗教的借口下，教导奴隶不要服从自己的主人，拒絕为主人效劳，而不是繼續作主人的勤勉地和尊敬地执行命令的奴仆”（第三教规）。

取了新的形式。殖民主义者把新“开发的”国家的“土著人”称为不具有同等价值的人。这种新的奴隶制又被天主教教会的首領教皇尼古拉五世和教皇克利门特五世神圣化了。

只是在几百年之后，奴隶制才遭到譴責而被废除。誠然，天主教教会的首領們偶尔也表示反对买卖奴隶，但只在1839年，当奴隶买卖实际上已經被許多国家禁止之后，教皇格里高利十六才对它正式地提出譴責。但是，过了百余年，联合国在1948年所通过的人权宣言中仍然不得不提到奴隶制，并譴責它存在于二十世紀。

在教皇約翰二十三世的通諭《Pacem in terris》（《地球上的和平》）中指出，在现时代所特有的基本现象中，人們越来越承认一切人都应有人权。这个通諭中承认：数千年来，許許多多民族都有一种“屈辱感”，可是，现在种族歧視“至少在理論方面”再也找不到任何为自己辯护的根据了。

中世紀里不同阶层和不同階級的人的不平等以及許多年代里农奴制的长期存在，使得那个与“人”这个概念相联系的人道主义观念，沒有扩大到絕大部分社会成員身上。农奴制实际上是奴隶制的温和形式。随着农奴制的崩潰和資本主义时代的开始，伴随雇佣劳动代替超經濟強制的同时，庄严地承认一切人毫无例外都有人权。

因此，严格地說，人的問題本身并不是那样早地以一般形态处于人道主义范围之内。

抽象的人的概念是文艺复兴时代和以后时代的思想家們所創造的。从理論上說，这个概念在“社会契約”論中已經表现出来，而从法律上說，它在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1789年法国的人权宣言这样一些历史文献中已經固定下来。这是一种在形式上宣布人的权利，这种宣布是以那种推翻了法律障碍、种族障碍、宗教障碍的人的观念为基础的。

一百多年前，历史已經給人們提出一个重要問題：如何把抽象的人提高为具体的人；如何才能使一切国家的人們能够实际享受人权，滿足和发展自己的精神需要；如何使人类的各个代表能够保証維持

自己的个人尊严，保証能过一种沒有毁灭性的掠夺战争、沒有饥饿、沒有貧穷和疾病的生活。

这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个辯証法规律的又一个例子。如果說，在認識中，抽象的东西是通过深入到现象深处并撇开具体的特征、对象和事物的方法而获得的，然后仿佛完成一个从抽象上升到多种多样的具体的相反过程；那么，在实际生活中，一般的東西是在斗争的特定阶段上表现出来的，并且在为实际地实现理想、为人的自由和幸福而根本改善生活的斗争过程中体现为具体的东西。

在我們时代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人的問題仅仅归結为宣布个人自由、平等、博爱这些人道主义原則，因为問題在于实现它們。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共产党宣言》是现实人道主义的头一个宣言。在这篇历史文献中，第一次科学地探討了通向这样一种社会的道路，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苏維埃共和国在1918年1月所通过的、并包括到苏联第一部宪法中的《劳动人民和被剝削人民权利宣言》，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法律上的头一次表现。

从宣布抽象的人道主义原則过渡到在生活中实际实现人道主义理想这个问题的现实意义，是由反人道主义的社会关系繼續在世界上系列国家中占居統治地位决定的。资本主义不仅沒有解决人的問題，反而使社会对抗达到頂点。与生产資料私有制相联系的人剝削人的现象，仍然是限制个人的主要禍害。

雇佣工人在法律上的自由，实际上使一小撮生产資料占有者获得自由购买劳动力的权利。对工人來說，形式上宣布的自由是“选择的自由”：或是处于雇佣奴隶的地位，也就是为那些掌握生产資料的人工作，或者是失去获得生活資料的可能性。在划分为資本占有者和在經濟上完全依附于資本家的人民群众的社會里，不可能有一切人处于平等地位的可能性。

我們知道：人民、民族、种族对于平等权利的要求，不仅沒有失去自己的力量，而且在我們时代——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民族解放运

动蓬勃高涨和殖民主义崩溃的时代——这种要求更成为进步力量的口号，它应当得到竭尽一切可能的支持。现在每个人、每个民族的精神潜力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现在，在形式上已承认在地球上诞生的每一个人都具有人类代表——世界文明的一切成果的继承人——的一切权利。但是，遗憾的是，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成为人的权利，还并不意味着每个人有成为人的实际可能性。决不能说自己爱人类却漠视世界上一半居民都是文盲（根据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的资料，世界上十六亿成年居民〔十五岁以上〕中大约有七亿是文盲）。决不能认为自己是人类进步的维护者却漠视最近几百年来为一小撮统治者的利益而战死的人数的曲线在不断上升（在十七世纪死了三百万，十八世纪死了五百五十万，十九世纪死了一千六百万，二十世纪死亡和残废的将近八千万）。资本主义的反人道主义性质表现在它不断地产生战争。这种情况在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

近几百年来，人类社会越来越有成效地掌握着自然力量，使科学和技术愈益完善。这个事实是很明显的。目前，对于进步的怀疑主义通常集中表现为这样一种怀疑：社会在技术方面的显著进步是否就是人的进步？人是否能从技术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或者技术的发展会导至人的精神贫乏？E. 施普兰格尔宣称：“技术的最新发展所引起的重大震荡，破坏了人们的精神状态。”^①

应该着重指出：不管主观动机如何，诸如此类的怀疑都是以片面的、歪曲的形式反映出现实的矛盾。解决这些历史矛盾的关键不在于抽象地提出问题：技术进步或是人的精神衰退，而在于深刻地探讨和彻底地消灭客观的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归根结蒂决定了人和技术的这种不自然的对立。

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已描绘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对抗悲剧的鲜明情景：“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

① 《我们的处境如何？》（«Wo stehen wir heute?», Gütersloh），1960年，第22页。

反面。我們看到，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於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技術的勝利，似乎是以道德的敗壞為代價換來的。隨著人類愈益控制自然，個人却似乎愈益成為別人的奴隸或自身的卑劣行為的奴隸。”^①

真正的科學研究不是停留在簡單地確認現象。例如，馬克思主義不只是確認人類文明的這種社會疾病的特徵，而是揭露這種疾病產生的原因和消滅的手段。人的勞動果實與人本身（首先是勞動者）的對立，是私有制統治和人剝削人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因此，毫不奇怪，正是對生產力的發展給與巨大推動的資本主義，使技術、科學和文化的進步同所有這些財富的真正創造者之間的分離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決不能不看到這種使人類智慧的成果轉而反對人類本身的社會制度是不完善的。反人道主義以一種特殊的力量表現為：技術進步被資本主義國家中反動勢力主要用於軍事目的；人類勞動創造的成果轉而反對人類，反對人類的後代。

社會主義的歷史使命在於消滅這些矛盾。有些人抱怨客觀進步和人的利益的對立，只是注意現象的表面，實際上卻為這些現象辯護。他們只限於制定一些抽象的空洞計劃，却不解決具體問題。與所有這一切人不同，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清楚地看出這些現象的社會基礎和克服它們的實際方法。

正因為如此，為了科學地解答下面這個問題：人是否在進步，或者只是人的社會“外殼”在進步，那就必須弄清和闡明人的社會本性和人的發展中各種矛盾的社會歷史根源。

數千年以來，文化、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是靠剝削勞動群眾而實現的，剝削使這種進步的創造者的個性受到壓抑，這種情況在歷史上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的時代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使這種矛盾埋進歷史墳墓、使每個勞動者同社會一道成長和發展的前提。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頁。

人的問題及其解決途徑

人類在其發展過程中形成和發展了不少美好的精神價值和道德價值，可是那些根本非人道的社會條件妨礙了這些價值的存在。因此，人道主義的中心問題就是如何保證為實現人道主義原則所需要的全部條件。

資產階級理論家們撇開人的現實的生存條件，議論抽象的人、一般的人。他們所談的主要是一些抽象的人類學的或認識論的問題——感性和理性、存在和本質、存在和目的等等的相互關係，這些問題本身是重要的，可是它們沒有指出實際解決人的問題的途徑。

在出席會議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中間，最有影響的和最有代表性的哲學家是各種不同的宗教神學流派——托馬斯主義、基督教唯靈主義、宗教存在主義等等的信徒。這並不是偶然的，而是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現代資產階級哲學思潮的現實情況。例如，如果說新實證主義的代表們根本不注意提出和解決與“人的命運和世界的命運”相關的問題，而直覺主義學派的信徒也和新實證主義者相似，主要注意於探討認識論問題，通常只是偶爾才談到人和現時代的問題、而且談到時也不過是片言只語，那麼各種宗教學說、特別是托馬斯主義則提出了或多或少完整的關於人的學說。

還應當指出，這些宗教學說之所以在資產階級國家中廣泛流行，也是因為它們力圖適應現時代的條件，利用了教徒們渴望消除戰爭威脅的心情。

宗教人士和宗教思想家們關於人要“為靈魂懺悔”、關於“個人精神完美和道德完美”的必要性、關於在世界上培養善良、慈悲和友愛的情操這樣一些蠱惑人心的說教，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其中許多人不僅反對“粗野的唯物主義”，而且造成一種錯覺，仿佛他們對“人被資本主義所敗壞”深感不安。可是，他們所批判的不是整個資本主義制度，而是個別的“冷酷无情的資本家”。